

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

刘青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



刘青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 / 刘青海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325-8874-9

I. ①李… II. ①刘… III. ①李商隐(812-约 858) —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5967 号

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

刘青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64,000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8874-9

I · 3289 定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为

上海市高校高峰学科建设计划资助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成果

序

昔沈曾植自称“吾诗学深，诗功浅”，陈曾寿赞徐苕雪之诗“深婉有味，蹊径甚正”，称其“诗才诗学，少见其比也”。又如李斗《扬州画舫录·草河录下》称孙兰“工书画，精于天文，诗学深邃”。凡此皆可见古人所言诗学之义。予昔曾著专文论述，复以黄山谷为例具体展示之。近年著文述学，亦多侧重于此。诗学合诗歌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两方面而言。然就实践一面而言，亦非简单等同于写作之事，而是侧重于构成此写作之事之学力因素。此诗歌方面之学力因素，昔曾以“鉴赏力系统”概括之。举凡个性、天资、心理等主观因素及社会现实、文化思潮等客观因素之影响于创作，自须另有途径加以探讨。然诗人之诗学即所谓“鉴赏力系统”，亦必藉此主客观各端以成其艺事，卓者并得跻身诗史，引领风骚。

刘君生长巴华，屈子、李杜吟咏之地也，赍华敷实，历代词章最盛。沐此乡风，故髫年即好诗词。曾述童子时未解学，然甚好太白诗，凡所见皆哀集之，欲为此公编一诗集。后每以此自哂，予则甚赏其事。既入上庠，跋涉书山，扬帆学海，虽于新诗、美文诸项亦多嗜好，而专注仍在古典诗学，且受北庠学风影响，重在鉴赏艺术、考证源流。若太白之得于康乐、玄晖；摩诘之取于陶谢、风骚，前人固多注意，而君探讨独深。至如论《文选》与试律诗以及汉唐献赋制度等，则多发前贤之未及。然其性情谦抑，每推人善而歉然视己。其旧日所著《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一种，藏篋十余载，余每督早日问世，而君

必待反复修订始出。

夫以“诗学”本义而言，义山实为最合适之探讨对象。义山早学古文，入令狐门下后改习今体。唐时有所谓词臣、词学者，实义山早年追求之理想。故其于比辞隶事之学，精究最深。昔人所谓义山獭祭鱼者，实为当时词学家之普遍作法，《白氏六帖》即其中留传于今者。此唐人词学之风气，始于初唐，而极盛于中唐，实为义山文学之重要背景。所谓“樊南穷冻”者，岂非以其不能用此词学于庙堂之上，得燕、许大手笔之功，而仅施于寻常应酬之间，词气屈抑，穷愁冻饿，类于江、鲍之体乎！然义山之最大成就，乃在以此词学之深功，施于言志缘情之诗学。其于韩孟倔奇、元白通俗之后，独寻正统，上溯李杜，求其雄伟深至。其《漫成》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不同于元微之扬杜抑李，隔阂两家，而于李、杜两家见其同处。此融合两家之绝大力量，即为义山诗学之根本也。故论唐代诗学之集大成者，少陵之后，义山为首出一家。此殆学者之共识。近期治义山诗者，多别求新学如朦胧、象征之义以说，且以义山为现代派。说故新奇炫目，然终不如还归唐代诗学之整体，循览其源流，重构其体系之切实有效也。此即刘君此著之基本动机也。

义山虽诗学深邃而发于议论者甚少，此故唐人诗学之常态。今从具体之创作中寻求其体系，实为甚难之事。刘君此著，既遵传统诗学体用两端的基本范畴，如言志、缘情、兴寄、怨刺及夫古近各体裁之流脉，复又重视义山诗学的个人特点与其独诣之处。如义山“元气自然论”，前贤虽曾论及，然于其学说之全体、思想方面之渊承及创作中之具体体现，实多未明之处。此著以义山“元气自然论”为其全部诗学之基石，且抉发其与中唐文道说之同异，以为当文道论流行之中晚唐之际，义山不循习常之说，而独究文道之体，发为元气自然之论。又义山之诗，向以人工造极许之，今则深论其根本仍在自然元气。此真可谓樊南之知音。义山无疑为缘情派之大家，无题诸作，为向来情诗之极致。后世如黄仲则以清浅学之，而风华已足绝世，然终不如义

山之华实相敷。顾其所至，汉《安世房中歌》所咏“金支秀华”、“清思眇眇，经纬冥冥”数语约略可状。然义山所缘之情，实本于志。故此著于义山诗学之言志本体推究甚深，此亦有别于向来之论。兴寄之论，发于陈子昂、李白，论初盛唐诗风者多能引述，然究竟表现如何，鲜少陈述。中晚唐兴寄风微，诗家多流于寻常体物状景，至有如贾姚苦吟，磨镌景物以穷年。义山浑厚华滋，情景兼到，其高于流辈，端在充分领会盛唐诸家兴寄风骨之说。故此著论义山兴寄及于艺术之具体表现，亦多前人之未发。又怨刺之论，亦为义山诗学之重要特点。此著由义山本人“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献侍郎巨鹿公启》）一论入手，追溯李杜、元白诸家之怨刺诗学以论义山承变，亦可谓探讨已深。

然传统诗学之现代阐述，究竟为极有难度之工作，此著自不能说已臻完善。其中观点若能引发学者继续探索，乃至相与商榷以得其真际，则为作者之所期也。

刘君以稿将付梓，嘱书数语以为引喙。是为序。

钱志熙

戊戌春暮于燕园

目 录

序(钱志熙)	001
绪 论	001
第一章 诗歌本源论:“元气自然论”	007
第一节 “元气自然论”的哲学本源及中晚唐 以“元气”论文的情况	008
第二节 “元气自然论”的提出与元结的关系	015
第三节 李商隐对“道”的独特理解	020
第四节 “元气自然论”与尚真、任情的诗歌思想	024
第五节 李商隐诗歌的“缘情”特征	029
一、无题诗对个人真挚爱情的艺术表现	030
二、李商隐“缘情”特征的三种表现	036
第二章 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	045
第一节 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的基本内涵和 艺术表现	047
一、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的基本内涵	050
二、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在艺术上的表现	054

第二节 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与缘情的关系	058
一、强烈的抒情性与言志的统一	058
二、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和其“感物兴思”的 诗歌思想	064
第三节 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对儒家诗教的偏离	069
一、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对传统文道观的突破	069
二、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对温柔敦厚诗教的突破	079
第三章 李商隐诗歌对传统兴寄观和兴寄艺术的发展	085
第一节 李商隐兴寄观的理论内涵和艺术表现	087
一、前人对李商隐诗歌兴寄的研究	087
二、李商隐兴寄观的基本内涵	090
第二节 李商隐对传统兴寄艺术的继承	096
一、李商隐对传统比兴方法、比兴意象的继承	096
二、人格化意象群的创造	106
第三节 李商隐诗歌对传统兴寄艺术的发展	119
一、表现内容的拓展	119
二、近体的兴寄化	128
第四章 李商隐的“怨刺诗学”及其艺术表现	147
第一节 李杜怨刺诗学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	147
第二节 元白怨刺诗学的理论内涵及其对李杜的批评	153
第三节 李商隐怨刺诗学及其对元白的反思	163

第五章 李商隐的体裁观念	169
第一节 李商隐对古体和近体的通达态度	170
一、古、近二体兼攻,近体偏擅的创作实绩	170
二、援古入律的艺术实践	180
第二节 李商隐对体裁和题材的多样化、个性化追求	191
一、对同一题材内的体裁处理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192
二、对同一体裁内题材处理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206
第六章 李商隐对前代的继承和发展	219
第一节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李商隐对杜诗艺术的 继承和发展	225
一、前人对李商隐学杜的研究	226
二、忧时伤世:对现实政治的自觉表现与深刻反映	230
三、七律——从古雅到精纯	239
第二节 直取其神,不离其形——李商隐对李贺诗艺的 继承和发展	274
一、前人对李商隐学李贺诗的研究	276
二、形神兼备:李商隐乐府歌行对长吉体的取法	279
三、李商隐学长吉体的特点	288
结 语	299
参考书目	303
跋	315

绪 论

二十世纪的李商隐研究,无论是在全集的整理笺注、生平事迹考证,还是在诗歌艺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产生了丰硕的成果^①,研究方法也是多样的。本书立足于传统诗学的立场,尽量运用传统诗学的方法与范畴,尝试全面、系统地重构李商隐的诗学体系。这方面主要借鉴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一书有关传统诗学的研究思路,并且部分地参考了该书的架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李商隐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诗歌本源论、本体观、兴寄观、怨刺诗学、体裁观、对前代的继承与发展等,进行深入研究。

“元气自然论”是李商隐诗歌本源论的核心表述,也是其全部诗学观的重要基石。李商隐“元气自然论”的哲学本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作为物质起源说的“元气自然论”。中唐柳宗元、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讨论是李商隐“元气自然论”的重要思想背景,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有关“气”的文学思想,也给予李商隐直接的启发。作为一种受道家影响明显的美学思想,“元气自然论”是对传统儒家以政教为基本功能的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补充。李商隐用“元气自然论”来解释具有明显变风变雅色彩的元结“危苦激切,悲忧酸伤于性命之际”

^① 有关李商隐研究的整体进展,可参看张忠纲等著《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第七章《李商隐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十二章《李商隐、温庭筠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以及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研究史篇》(合肥:安徽师大出版社1998年)。

(《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①的文学创作,指出其由变而返正的创作实质;但更多的是借此提出他自己不同于韩愈一派古文家的文学起源论和文道论。“元气自然论”所包含的尚真、任情的审美思想,是造就李商隐诗歌创作在题材与风格上的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也由此形成李商隐诗歌整体上的“缘情”特征。

诗歌本体观是诗人对于诗歌本质的理解。对于诗歌本质、诗歌最根本的表现对象的不同理解,构成了不同的诗歌本体观。^② 李商隐的诗歌,因为其总体上主情的特征和艳丽的风格,往往被认为是“缘情”的;又以对社会现实关注的深度和广度而被冠之以“诗史”的美称,他本人也曾明确标举“诗言志”(《献侍郎巨鹿公启》)。也正因为如此,历来对其诗歌本体观的判断存在较大的分歧。我们认为,其言志的诗歌本体观在创作早期就已形成,并对其独特诗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虽然随着诗人现实政治热情的消退而在艺术表现上有所变化,但言志的诗歌本体观却是一以贯之的。当然,其诗歌突出的“缘情”特征也是不容置疑的,并且构成其个性化诗风的重要部分。李商隐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本书主要从其基本内涵和艺术表现、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及其对传统文道观和温柔敦厚诗教的突破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从《诗经》开始,比兴一直都是诗歌重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歌审美的重要范畴。李商隐自道“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③,对于诗歌的兴寄有着自觉的追求。其诗歌不但继承了传统的比兴方法和比兴意

①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本书所引李商隐文,除特别说明,皆据此书,为避繁琐,不一一出注。

② 对于传统本体观的划分,主要参考了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第二章之《小引:本体反思与诗学实践的关系》有关论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3—74页。

③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本书所引李商隐诗歌,除特别说明,皆据此书,为避繁琐,不一一出注。

象,创造出艺术上高度成熟的人格化意象群,而且在表现内容的拓展和近体的兴寄化两方面对传统兴寄艺术作出了重大发展,在总体上具有兴寄的性质。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其兴寄观放在从诗骚到晚唐兴寄发展的链条上,考察它的基本内涵及其对传统兴寄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和比兴一样,怨刺同样是《诗经》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李杜是盛唐怨刺诗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皆标举风雅,推崇“微婉”,但李多用比兴,而杜多用赋,艺术上有隐和显之别。中唐元白重新提倡美刺之说,白尤重诗歌的讽谏功能,故重杜而轻李,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李商隐“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的批评,不仅不满于元白只取李杜之怨刺,也不满于元白对李杜怨刺诗学领会之偏。李商隐的怨刺诗学以其独特的文道论为基础,越过汉儒诗教,将怨刺诗学直接《三百篇》以来中国古代士人关心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创作上具有直言无隐、放言无忌的特点,故不免招致“思无不邪”的批评。在艺术上,李商隐的怨刺诗兼学李杜而能变化,在反映现实之深广和艺术之隽永两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艺术成就,也由此成为唐代怨刺诗学的又一大宗。

体裁观是诗学观中围绕诗体问题所展开的部分,包括诗人全部创作的体裁分类,对于不同诗体艺术特征与功能的把握、特定体裁的创作法则以及各类体裁的源流演变等方面的具体看法,是传统诗学的核心问题和最具有实践性的部分。本书研究李商隐的体裁观,主要关注他对古近二体的态度和处理体裁和题材关系的基本原则。李商隐是古、近二体兼攻而近体偏擅的诗人,无论数量还是艺术成就,近体的创作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和晚唐诗歌体裁发展的总体走势是一致的。其古体诗虽然数量不多,却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成就,无论五古、七古、五言古绝,都是该体裁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在具体的创作中,李商隐对于体裁和题材关系的处理遵循两条基本的原则,即对同一题材内部体裁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追求和对同一体裁内部题材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追求。

继承与发展是李商隐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清代笺注家对此问题贡献最巨。李商隐对杜诗的学习,在清人不惮繁细的笺注里已经成为定论,今人的研究大体上不出清人笺注的范围,但在具体的问题上更加深入细致^①。李商隐学古取径甚广,无论诗骚、汉乐府、齐梁体以及本朝李、杜、韩、孟、李贺等诸多诗人,皆多所取法。本书试图尽可能地再现他对于前代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原初图景。杜诗和长吉体是李商隐学古拟古的重要对象,对于其独立的诗歌创作道路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其个性化诗风得以确立所必经的环节。因此,笔者以李商隐学杜和学长吉体的诗歌为研究对象,在中晚唐诗歌新变的背景下,深入考察杜诗、长吉体和李商隐个人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由此探究其个性化诗风与诗歌传统、时代诗歌潮流之间的关系。

上述六个部分相互联系,共同构成李商隐的诗学观。其中,诗歌本源论和本体观是其诗学观的两大基石,继承和发展是其诗学得以发展的动力,它们和兴寄观、怨刺诗学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他的体裁观念。

根据钱志熙在《“诗学”一词的传统涵义、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②一文中重新阐释的“诗学”这一概念,本书所指的李商隐的诗学,并非仅仅是他的诗论和一般性的诗歌思想,而是指同时存在于其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两个领域中的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李商隐的诗学,简单地说,指的就是其诗歌创作的“鉴赏力系统”^③,它活跃

① 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有刘学锴《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钟来因《〈高唐赋〉的源流与影响》(《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李商隐“赋高唐”诗解》(《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等。

② 《中国诗歌研究》2002年第1辑。

③ 这个词借用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的提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16页。按照钱著的解释,所谓“鉴赏力”,也就是传统诗学中所说的识力,它和创造力是相互制约的,文学创作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对于创造力而言,鉴赏力更多地依赖于后天的培养,是学力、技能的综合,属于意识性的因素。鉴赏力是诗人全部诗学素养的反映,因此,所谓诗学,可以说就是特定诗人的鉴赏力的体系。

在其全部创作之中,并在具体创作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那些为他所明确表述过的、历来为文学研究者所重视的理论与批评的文本,不过是我们所窥见的其诗学体系的冰山一角罢了。本书的任务,是试图通过考察李商隐的全部创作来揭示其诗学的全貌。当然,受到文献和学养的限制,本书的表述离其诗学的原貌恐怕还有一定的距离。

第一章 诗歌本源论：“元气自然论”^①

李商隐是继杜甫之后，在唐诗的抒情艺术上作出巨大贡献的诗人。尤其是他的近体诗，在杜甫律诗所达到的抒情强度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在情感类型上，在杜诗较缺乏的抒发个人生活体验方面，创造出“无题”这一新的诗歌类型。同时在现实情感、政治情感等方面，也有新的推进。传统对于李商隐诗歌抒情性的思想根源或者说美学思想的解释，都是从“诗言志”、“诗缘情”等思想出发来认识。言志、缘情当然也是李商隐抒情艺术的美学原则，但是仅从这方面来认识，是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的。作为一个在诗歌抒情艺术上有巨大发展的诗人，李商隐在抒情美学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有学者已经指出其“元气自然论”与他诗歌创作中的情志表现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李商隐以“元气自然论”为思想基础的整个抒情美学体系，显然还缺乏完整的把握。

笔者认为，李商隐的“元气自然论”的哲学本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作为物质起源说的“元气自然论”，是中唐柳宗元、刘禹锡重新思考天人关系的当代哲学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李商隐用“元气自然论”来概括元结的文学，但更多的是借此提出他自己不同于韩愈一派古文家之文道论的文学起源论。其中所包含的尚真、任情的审

^① 本章的主要内容，以《李商隐“元气自然论”及其尚真、任情的诗歌思想》为题，刊发于《文艺研究》2017年第8期。